

---

# 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批判

## ——评日本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

何 理

---

近代中国长期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中日两国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各种方式的斗争与争论,其中包括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以及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而进行的长期的军事、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而且,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性质的斗争和争论至今并没有结束。这是因为,虽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中日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日本一部分右翼反动政治势力仍然顽固坚持军国主义政治立场和军国主义历史观,公然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妄图推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民主、进步、正义力量对反动、灾难、邪恶势力的胜利这一重大历史公案。1993年,在自民党内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经过较长时间的组织策划,由19名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观点的历史研究者,进行了20多次讲演,并于1995年8月15日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该书集战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言论之大成,公开否认东京审判的正确性,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自卫战争”和“解放亚洲的战争”,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行和“南京大屠杀”等等罪案的存在。另外,围绕“教科书”问题,东京大学教育部教授藤冈信胜等人组成“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要求删除“教科书”中有关“从军慰安妇”等内容,纠正“自虐的历史认识”,培养“健全的日本人”,树立年轻人对日本历史的“自豪感”。通过这些活动,把关于如何对待近百年以来,特别是如何对待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历史问题,日本国内一些人与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所进行的争论推到了极致。可以说,这种争论的性质,仍然是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斗争,以某种政治的或者理论的形式继续。1996年9月3日,江泽民主席在谈到中日关系时指出:“中日关系目前总体上是稳定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分歧,主要是日本政界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众所周知,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但是,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一些人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事情,特别是最近以来,一些内阁成员竟然络绎不绝地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之流的亡灵招魂,一些国会议员竟然纷纷散布掩饰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恶的奇谈怪论,这表明日本国内确实有那么一股势力企图重温军国主义的旧梦。他们的言行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愤慨。日本今后究竟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还是别的什么道路,应当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日本必须妥善处理历史问题,肃清反动的历史观,才能有助于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有利于日本同邻国建立信任关系。”(《人民日报》1996年9月7日)1997年是中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25周年,回顾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进程,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恶劣影响,无疑仍然是中日关系及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

军国主义历史观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军国主义反动政治观念的重要表现。它是一种以军事霸权为特征的战争史观和专制统治观念,反映了从军国主义基本立场出发,对世界历史和国家关系的总体认识。

军国主义是一种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

治制度,其由来已久。近代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落后的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与半封建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结合。18世纪以来的普鲁士、沙皇俄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比较典型的近代军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殖民地,建立殖民帝国,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加强军备,推进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军事化,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强化对本国人民的武力镇压和专制统治。特别是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势力范围,都出现了明显的军国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快了军国主义化的进程。列宁说:“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6页)这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是军国主义形成和崛起的时代,这个过程是同帝国主义的形成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19世纪末期以来,连续不断的大国间的国际战争,特别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充分证明了军国主义的罪恶和它给人类生存发展所造成的灾难。事实表明,帝国主义是与世界性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军国主义则是侵略战争的原动力。

近代日本是一个依靠侵略战争起家的国家。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政治基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制度。

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近代化基础是由官营军事工业发展起来的;日本财阀势力及垄断资本也是在国民经济军事化和对外侵略战争过程中逐步强大并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的。明治政府大力利用和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扩充改造原幕府及各藩所有的武器制造、开矿、冶金企业,并投资兴建一些纺织、水泥、火柴、酿酒等民用工业。如改造和兴建东京炮兵工厂、长崎制铁厂、石川岛造船厂、鹿儿岛造船所、横须贺制铁所等,开设东京到横滨的第一条日本铁路和电线,开通电话和邮政,这些官办军事企业以及与军事相关的企业,在日本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近代化中起了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19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将大部国有企业廉价转

让给一些有政治背景的财阀,这些财阀长期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保护,构成日本垄断资本的主干和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近一个世纪以来,日本垄断财阀主要是依靠对外侵略战争来牟取暴利。如三菱公司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凭借着与政府重臣的特殊关系,获得大量特权。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三菱公司受命承担军事运输,共赚得利润275万日元,相当日军侵台经费的1/3。西南战争中日本政府军费开支4100万日元,其中三菱公司赚去1500万日元。可以说,没有侵略战争,就没有日本的垄断财阀,也就没有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

明治维新后形成的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是日本军国主义制度和思想观念得以存在发展的重要土壤。由于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且在西方列强压力下“开国”,具体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决定了日本明治维新不论从其历史内容,还是社会性质来说,都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格。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虽然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日本社会严重的封建主义因素不仅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且构成推动日本国家迅速军国主义化的社会条件。明治维新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口号,富国强兵乃其中心。富国强兵的核心是采用西方的工业技术,发展社会经济,争取日本对西方列强的独立及向亚洲邻国的扩张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日本在历史上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同中国等邻邦有相同的境遇。开国后的日本依然存在被西方列强奴役的危险。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民族主义就很自然地同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并以其为理论武器。日本的启蒙主义思想也不同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一方面,它接受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代表了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要求;另一方面,日本的启蒙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军国主义的色彩。即使是当时代表日本民主主义进步倾

向的自由民权运动,其主要着眼也在于日本对外发展的民族主义方面。日本启蒙主义代表也不同于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欧洲启蒙主义者。他们一面主张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另一面,也是其主要方面,是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日本对外扩张,发展军国主义制造舆论。如当时曾喧嚣一时的“脱亚论”,其主旨即在于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亚洲其他民族,主张日本仿效西方国家,进入世界列强的行列。他们提出的“伸张民权”、“扩展国权”主张,其重点仍在“国权主义”。这就是对抗西方列强,争取日本独立,对东方邻国,实行强权政治,进行侵略扩张。福泽谕吉在《外交论》中说:“当今各国相对待的社会其势如禽兽相食的世界,食者是文明国家,被食者是非文明国家,我日本应加入食者行列,也应该寻求良饵。”(转引自赵福超《略论福泽谕吉侵略中国、朝鲜的思想》,《北京档案史料》1996年第4期)良饵乃中国、朝鲜等邻国。日本从它近代化一开始就把对中、朝等国的侵略作为自己民族发展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政治基础是近代天皇的绝对专制主义制度和“皇国史观”。日本反动统治集团制造了一种荒谬的历史观点,即日本的历史不同于其他国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立斗争的历史,日本的全部历史都是天皇与人民一致的历史。早在14世纪,日本史书《神皇正统记》就将“天神肇国”传说进一步理论化,发挥了日本“神国”思想。明治维新确立了天皇专制主义政体。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不仅是日本国家元首,而且是日本国家和人民统一的最高象征及政治观念上的代表。天皇制专制政治与“皇国史观”,在日本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天皇绝对崇拜,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极端形态。

军国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精神支柱是作为日本国教的国家神道。“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大寡头政治继续存在,但他承认国民参加政治的概念。而且它还加强了家族、社团组织生活感情等构成国民

大众所支持的传统的社会支柱。”(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 页)由于近代日本社会的落后性质及社会思想分化的不充分,低级原始的宗族势力和宗教观念制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天皇制的专制统治和“皇国史观”,是与比较原始的国家神教及所谓“大和魂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日本国教神道与一般的宗教不同,它比中世纪其他宗教具有明显的现实的政治功能。神道对所谓“神”的崇拜只是抽象的、理念的,对天皇的崇拜才是具体的、现实的。而且,在日本传统的宗教哲学与国家神道中,神也是比较世俗的,而非完全超验的,诸如灵魂与肉体、来世与今世、天堂与地狱、善与恶以及天皇与国民等都是同一的和浑然一体的。日本国家神道没有什么成形的经典,对灵魂、来世等问题也缺少系统的理论。“在日本,‘神’的含义与西方的含义不同。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就象他父母师长是小神一样……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每个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家族血缘关系,认为天皇是他们的父亲。”(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新华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 页)

日本“国家神道”是一个庞大的、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组织,上至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下至各地方的大小神社,全国总共有各种神社 11 万座。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国学”通过对《源氏物语》《古事记》等古籍的研究,强调反对儒学影响,发掘日本固有的“大和心”,复古神道,恢复天照大神和天皇的统治之道。1868 年日本政府明令复古神道,以神道为唯一国教。通过“祭政合一”运动使神道完全政治化。正如一些研究学者所指出的,“国家神道所关注的是对国家象征的适当崇拜。在学校里,国家神道变成一部神代以降的日本历史,以及对万世一系之统治者天皇的崇拜。”(R. 本尼迪克特:《菊与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年版,第 63 页)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教育主要是向人民灌输天皇神教,以天皇为日本乃至世界至高无上的神。“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谕”是日本真正的圣典。在日本全部政治意识和社会道德观念中,以对天皇的忠

为其绝对的最高德性,把对天皇的“忠”,作为日本人至高无上的“德”。“武士道”也是强调“忠节”,为天皇效力,并用禅宗的修炼办法,训练士兵的忍耐、勇敢、绝对服从、剖腹尽忠、暴虐杀人等拼杀精神和野蛮残忍的性格。事实证明,这种比较原始的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思想道德意识,其结果必然是只知有天皇,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其他,在政治上一定造成蔑视日本民众,蔑视世界其他民族,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妄图君临其他国家、称霸世界的反动倾向。

## 二

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核心是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邻国的态度。明治维新后,日本一面继续忍受西方列强的压迫,一面积极向其亚洲邻国中国、朝鲜等侵略扩张。反套一句中国成语,日本是失之桑榆,而取之东隅。即在西方失去的利益,要从东邻各国找回来。1855年,美国与俄国签定友好条约后,长州藩士吉田松阴说:“俄美和亲条约一定,我方便绝不可破坏之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趁此时机培养国力,分割易于攻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中之损失,复以鲜、满土地补偿之。”(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以福泽谕吉为代表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提出所谓的“东洋盟主论”、“脱亚论”,大力鼓吹日本不能以“唇齿关系”、“车辅关系”对待中日关系及日本与其他亚洲邻国的关系。日本要在文化、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等方面脱离亚洲,不与中国、朝鲜诸邻国为伍。日本要与西方列强联合,共同压迫各亚洲国家,称雄亚洲,作东亚的盟主。鉴于英、俄等国在东方的殖民统治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福泽主张日本也不能消极退缩,必须积极进取。“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予以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处理之。”(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

史》第三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8 页)日本作为东洋的盟主,应该领导邻国脱离固陋之习,以文为行,以武继之,日本要效法英国统治印度的榜样,独霸东洋权柄,做在亚细亚的新大英帝国。日本陆军创始人、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的《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论》等文件认为,日本生存必须要保护“主权线”和“利益线”。所谓“主权线”就是日本本土,“利益线”即中国东北、朝鲜等与“主权线”安危紧密相连的地区。1874 年,日本出兵侵占中国领土台湾。1894 年,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从中国掠取巨大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并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1900 年,日本充当了西方列强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急先锋,取得在中国部分地区的驻兵权。1904-1905 年,日本在中国领土上发动了对沙皇俄国的战争,霸占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一个野心勃勃、侵略好战、暴虐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在亚洲崛起。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想猛烈发展和急剧膨胀的关键。此后,一些日本政治家即大力鼓吹扩张军备,加紧推行军国主义,把日本的生存发展建立在对其他邻国的侵略和掠夺基础之上,为军国主义战争制造舆论。

一曰“生存发展论”。日本自身领土狭窄,资源有限,其独立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同邻国进行交流,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但是这种关系必须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日本以反动的民族主义立场对待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国家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教训,把整个人类历史看成是一部弱肉强食、有力者称霸、无力者为奴的历史,什么社会进步、人类文明、正义和平等等人类社会基本准则,统统是子虚乌有。在这种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支配下,随着日本国力的发展,在日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社会政治观念,即日本的生存发展,必须对抗西方列强的压迫,而且更重要的是,走西方列强的老路,向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侵略扩张,掠取殖民利益。明治维新以后,把中国、朝鲜等国作为日本发展的资源基地和扩张对象,几乎



成为日本统治集团一种不言而喻的和天经地义的信条。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的反映,也是与那一时期所谓“主权线”、“利益线”理论一脉相承的。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及其后内阁首相田中在向天皇奏议中明目张胆地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时,日本为进一步独霸中国,明目张胆地提出“满洲是帝国的生命线”。“满洲”问题,几乎成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以及日本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

二曰东方“民族解放论”。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在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与对抗的历史环境中。驱除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重要倾向。日本企图用某种亚洲“门罗主义”,抵制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殖民统治。为达到以上目的,日本企图利用亚洲国家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进一步扩大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并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美其名曰对亚洲国家的“解放”。本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提出:“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决不能取得独立。”(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提出的“共存共荣”,以及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是以上思想在国策上的具体表现。1942年1月21日,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帝国议会的演说中就说,“建设大东亚之根本方针,实渊于日本肇国之大精神,使大东亚各国及民族各得其所,根据以帝国为核心之道义谋求确立共存共荣之秩序”(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83页)。1943年前后,由于战局的转变及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抗日运动的胜利发展,日本军国主义已感到力不从心,于是通过建立傀儡政权的方式,让一些被占领国家在名义上“独立”。当年11月日本政府在东京主持召开了有南京伪政权主席汪精卫、“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以及缅甸、菲律宾等傀儡政权代表参加的“大东亚会议”,旨在强化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会

议发表的“大东亚共同宣言”说,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目的在于“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使亚洲国家“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鼓吹亚洲各国要在“独立”、“主权”的基础上,“共存共荣”,合作发展。让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民族败类粉墨登场,扮演所谓被解放了的亚洲国家代表,这是对日本鼓吹的“民族解放”和“大东亚共荣圈”最实际、最确切的注解。

三曰“自存自卫论”。日本军国主义以“大日本主义”对待中国、朝鲜等国的主权和利益,以“大亚细亚主义”对待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其向邻国扩张的主要借口,不外是因为别国维护主权的正当行动,妨碍了日本的利益。因此,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出于“自卫”。自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全面战败之前,日本同亚洲各国完全处于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进行了英勇的长期反抗和斗争。这完全是革命的、进步的、正义的行动。从军国主义反动政治立场出发,日本统治当局反诬亚洲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对日本生存的威胁,这又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其他国家的借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制造各种借口和社会舆论,诬蔑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及爱国抗日运动威胁了日本“生命线”的安全,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必须出兵“保护”。依照这种强盗逻辑,1931年,日军发动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了历时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这种以“自存自卫”为口实的军国主义战争观一直延续到战后。吉田茂在他的《激荡的百年史》中仍然认为,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在中国和满洲,内战带来的混乱状态和排日运动,使居住在那里的日本人受到了压迫”。日本武力占领东北,也由于“对于象中国那样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很难采取完全按法律办事的态度”(同书第36页)。关于卢沟桥事变,日本不是至今还有人在坚持这是中国军队挑起的,日军完全出于“对应自卫”的吗?

### 三

军国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在日本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的意识形态,它既是军国主义制度对日本社会长期统治和毒化教育的结果,又是战后“冷战”思维和反共政策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遭到彻底失败,但军国主义长期统治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和思想意识形态仍然在社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制约日本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单独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根据《波茨坦公告》等盟国的共同协议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美国占领军对日本执行了非军事化政策和民主改革,以图完全铲除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新宪法剥夺天皇总揽一切的权利,只规定“天皇是日本的象征”。同时进行旨在使日本民主化的社会改革,解散作为天皇制基础的军部及枢密院、贵族院等特权机构,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解散财阀,进行农地改革,铲除天皇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应当肯定,以上重大政治经济改革,对战后日本国家的民主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日本近现代历史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和“反共”的需要,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某些方面采取了一定的包庇和纵容政策。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美国在亚洲经营的重点由中国转向日本。1947年,美国政府抛出“杜鲁门主义”,认为日本是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唯一国家,因此,应关心复兴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1948年3月25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提出:永久性地占领冲绳;重建一定限度的军备;加强警察力量,防止共产

主义化;恢复日本政府复兴经济的权利;不提出新的民主化措施,对已实施的不加压力;修改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排除垄断的政策;及早发现和处理乙级、丙级战犯嫌疑中的无罪分子;日本文化亲美化等 11 项建议,从而确定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导向。在美国的主导下,由于对日本战争责任、战争罪行的清算,对军国主义社会政治影响的肃清,都做得很不彻底,以至使战后日本的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与战前社会具有较为明显的继承性。

首先是关于日本天皇的地位问题。战后,日本共产党等日本国内进步势力以及苏联、英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要求废除日本天皇,清算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进步政党和主张实行民主制度的人士不论在战前战后都坚持反天皇制立场,认为天皇制是日本民主化的障碍,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和祸首,主张追究天皇及天皇制的战争责任。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坚持保留天皇,免除对天皇的审判。其后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以及其后对天皇制批判的不彻底,直接妨碍了在日本进一步消除军国主义的社会影响,清算战争责任,树立起国民正确的历史观和战争观。

其二是关于对日单独媾和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问题。根据 1948 年 10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NSC 13/2 文件》,美国积极策划对日单独媾和,以便使日本在国际“冷战”和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51 年 9 月,美国不顾中国、苏联等主要参战国的反对,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签订《旧金山和约》,实现对日单独媾和。《旧金山和约》继续承认美国在日本驻军,但对日本的军备未加限制,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也未做明确的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旧金山和约》也为右翼势力翻侵略战争的历史旧案,妄图恢复军国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同时签订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进一步把日本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其三是关于重新武装日本问题。1950 年,美国指令日本政府成立 7.5 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厅人员增加 8000

人,拨款 12 亿日元军费。日本海上保安队在美军的指挥下参加了朝鲜战争。1951 年美国要求日本把警察预备队扩大到 32.5 万人,但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受战后宪法的制约,害怕国内民众反对,未敢立即实施。1954 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成立自卫队,重建陆海空武装,兵员数量达 30 万人左右。

其四是关于战犯的处理问题。战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战争罪犯采取了包庇纵容政策。东京审判除东条英机等 7 名甲级战犯被审判处决外,免除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审判,释放了被视为有利用价值的岸信介、重光葵等甲级战犯。其中岸信介在后来组成的自由民主党内担任干事长,并在 1957 年出任首相;重光葵再度出任外相;儿玉誉志夫成为政界的幕后操纵者和右翼势力的首领。同时在美国的策动下,由英国、中国国民党政府等负责关押的日本战犯也被陆续释放。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获释后又积极参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反华反共活动。以后的事实表明,当时释放的这些战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掌握了战后日本的政治,给其后日本国内的政策走向造成重大影响。美国的上述做法,使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在战后不仅没有得到比较彻底的肃清,而且让一些右翼势力能够重新集聚发展。

日本《赤旗》报文章指出:“内阁成员屡屡发出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并不是偶然的,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其根源在于战后战犯政治之中。”(《参考消息》1985 年 9 月 6 日)事实也证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复活军国主义的努力。如战后东久迩内阁公然企图维护天皇制,继续以法西斯主义的《治安警察法》和特高警察镇压反天皇的“共产主义”者,反对日本的民主化。1946 年,币原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仍然主张“天皇最高不可侵犯”,“天皇统帅日本军队”。1950 年,旧军人服部卓四郎等企图利用警察预备队建立之机,重建昔日皇军威仪,计划建立陆军 20 个师 30 万人,海军舰艇 15 万吨,空军飞机 3500 架,并由天皇统帅这支军队。1957 年,岸信介内阁的宪法调查委员会企图恢复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和国家元

首地位。当然,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民和国际和平进步力量的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以上企图未能实现,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不可忽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及其进一步活跃,也确实在日本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重大影响。据日本警视厅估计,当前日本右翼组织有1000个以上,成员由10年前的12万减少至9万人,在社会上渐失支持,但活动仍然十分猖獗。当前在日本国内,宣扬军国主义历史观,十分卖力地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社会基础仍然是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反对民主政治,鼓吹对外扩张右翼势力。正是这些反动右翼势力,继承了天皇专制时代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衣钵,成为日本进一步民主化及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正确认识近代日本与亚洲其他各国的历史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关系的巨大障碍。

#### 四

军国主义历史观是军国主义政治观念的反映。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鼓吹军国主义历史观,为侵略战争翻案活动,既是已经破产的军国主义行为、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又是当前日本国内某些政治动向的反映。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日本国内一些人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如从1963年起,每年“终战日”由政府主持召开“全国战死者追悼会”,1964年4月29日(昭和天皇生日)开始,给战死者授勋。从1963年到1965年日本重要杂志《中央公论》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文章,公开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80年代,“教科书”问题被提出后,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在关于历史的认识和评价问题上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一)关于战争的性质和罪行问题。日本军国主义从明治维新后,接连发动了对中国、朝鲜等邻国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严重灾难。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铁案如山,不容推脱。

1945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通过的《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确认,日本发动的战争“违反国际法规,犯下了残虐行为的刑事犯罪”。东京审判对日本违反国际公约所犯战争罪行及反人道罪行作出明确判决。但是长期以来,日本一些政府首脑虽然在一定的外交场合向朝鲜、中国及其他亚洲被侵略国家表示“道歉”,但对于战争的侵略性质及日本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却采取十分暧昧的态度,而且在关于日本侵略战争性质的问题上,日本一些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80年代文部省的“教科书”问题,把侵略改为“进出”,在国内外闹得沸沸扬扬,受到亚洲国家的严正批评。文部相藤尾正行等人对以上批评进行了狡辩,反诬日本并吞朝鲜,朝鲜“负有责任”,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为了排除抵抗”,否认日本有战犯。1988年,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说,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卢沟桥事变是偶然发生的”。1990年运输相石原慎太郎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等等。1989年,首相竹下登说,“这场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的问题,应由今后的历史学家去评论”。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表示,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这是日本政府迄今最明确的表态。但是这一正确说法却遭到国内右翼势力的猛烈反对。《产经新闻》当即发表通栏广告标题:“对细川的历史认识有疑问——日本进行了侵略战争吗?”遗族会发表了“抗议声明”。日本政府要员歪曲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迭出不穷。1994年,法务相永野茂门说,“把太平洋战争说成侵略是错误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并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自民党议员户田一郎说,“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

(二)关于向受害者谢罪和赔偿问题。日本的侵略暴行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灾难和痛苦,战后日本理所当然应诚恳认罪并向受害者进行赔偿。为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力量的经济基础,美国在战后不久曾设想让日本向受到其侵略的国家进行战争赔偿。1946年5月,美国提出了对日中间赔偿计划,将1000

多个工厂指定为拆除赔偿工厂,并将 17 个军工厂,1.9 万台工作母机分别迁往中国、菲律宾、英国等地。但是,1949 年美国却改变了态度,不顾中国等国家的反对,决定停止中间赔偿计划,使大部分指定要拆迁的工厂得以保留下来。随后,苏联、中国、印度等国家也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另一方面,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完全表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变异态度。它一方面强调日本也是受害国;同时认为,其承认的赔偿,只是“战败国”的赔偿,而不是对战争罪行的赔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主要盟国德国相比,德国战后 40 年,共支付 864 亿马克赔偿费(合 560 亿美元),而日本只支付了 2500 亿日元(合 22 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却不断增加对战死者的抚恤。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政府从 1950-1994 年共向战死者遗族提供抚恤金约 38 万亿日元,是其向国外支付的各种赔偿的 57 倍。但是日本对被残害各国人民的赔偿却基本没有进行。最近几年提出的“慰安妇”问题、“劳工”问题以及在各次大屠杀惨案中众多被害者的赔偿问题,日本有关方面的态度更是令人难以容忍。1996 年 6 月,奥野诚亮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大放厥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当局强迫亚洲国家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商业行为”。正如一些公正舆论所指出的,这是对广大被害妇女的极大侮辱和精神上的继续加害。

(三)关于所谓“不战决议”问题。1995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世界各国人民都期望日本政府能在此时通过一个决议,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责任、罪行表示明确的态度。但是,这却在日本国内受到巨大阻力。自民党议员奥野诚亮等组成“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强烈抵制通过“不战决议”,反对“谢罪式的不战决议”,叫嚣不能“使战后被歪曲的历史法律化”。永野茂门声称,“不战决议将使日本永远被贴上残忍民族的标签”。1995 年 6 月 7 日,以永野茂门为干事长的日本新进党“正确讲述历史国会议员同盟”通过决议,“强烈反对任何有关对过去战争的历史观和道德价值观作出判断的国会决议”(《参考消息》



1995年6月9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表示说：“日本在战争问题上与德国不同。德国是希特勒通过国家意志和组织屠杀犹太人。日本不是这样。日本历届首相在访问有关国家时，总要在公开讲话中表示道歉，天皇陛下也表明了遗憾之意。如今与其在国会再讨论，不如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向国外道歉是一种空虚的表现。”（《光明日报》1995年3月1日）6月9日，日本国会通过的以《重申我们吸取历史教训支持和平的决心》为题的所谓“不战决议”，语词含混，态度暧昧，令各国和日本国内正义进步力量大失所望。在这个区区数百字的决议中，完全回避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及战争的侵略掠夺性质，却侈谈什么“世界近代史上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的种种行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决议，也受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日本遗族会副会长木广荣说：“我们认为，在列强从事侵略的行为的情况下，日本是为了把亚洲从欧美民族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卷入了战争。因此，决议解释为日本自己犯下了侵略行为是矛盾的。我们并不反对和平的决议。我们之所以反对，乃是忍受不了对曾经为了国家而牺牲生命的阵亡者的名誉进行伤害。这次决议使人有阵亡者名誉扫地的感觉，令人极为遗憾。”有资料表明，1995年前后，日本47个都道府县的议会中已有18个议会通过了追悼战死者，美化侵略战争的决议。

（四）关于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象征。它始建于明治二（1869）年，原称“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靖国神社”，供奉着246万在历次战争中战死者的牌位。1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被安放到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陈列的内容和浮雕系统地表现了日本发动侵略中国、朝鲜等国家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神社”，历来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和支持。1969年以后在日本国会多次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要求由国家“护持”靖国神社。这个法案因为与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有冲突，未能通过。但“靖国神社”却成为右翼势力宣扬侵略武功，美化战争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重要场所。1985年，中曾根

康弘正式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和强烈抗议。嗣后,每年所谓“终战日”都有首相或内阁成员以各种不同名义到靖国神社进行参拜。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又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1996年8月15日,日本举行了“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日本天皇和皇后及阵亡者遗属、各界代表7000多人参加。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会上致辞,对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人表示追悼。同日,又有6名内阁阁员参拜靖国神社。1997年8月,日本有12名内阁成员和190名国会议员及其代表参拜靖国神社。

以上事实说明,右翼势力在日本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从明治维新开始,军国主义在日本进行了近百年的统治。军国主义的政治观念和歷史观念根深蒂固,几乎毒化了整个近代日本社会生活。据近年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社会传播媒体的调查,20-30岁的“年轻一代,对天皇制的关心越来越淡薄,但天皇制意识充斥日本社会是不争的事实”。30年代右翼法西斯组织充当了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急先锋,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成为复活军国主义、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吹鼓手,其行动又何其相似乃尔!如(一)鼓吹对天皇的崇拜,为天皇专制制度扬幡招魂;(二)美化侵略战争,为历史上的战犯歌功颂德;(三)要求修改限制日本军事扩张的“和平宪法”;(四)勾结和利用黑社会势力,制造恐怖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仅1989-1993年间,右翼势力制造针对政府、政党、企业、法院和报社的恐怖事件即达66起。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巧合,它难道不正是30年代军部法西斯势力袭击政府、暗杀重臣等行径的复活吗?

## 五

军国主义历史观产生于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强权政治时代,是同以军事争霸为主要特点的民族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帝国主

义的旧的历史时代相适应的。战后的“冷战”思维和军备竞争也为军国主义历史观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应当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军国主义、世界霸权主义的一次大失败。战后虽然也经过较长时期的“冷战”局面,但世界总的发展潮流是趋势和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经济、科技、文化的飞速发展,迅速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改变着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关系。以新科学为基础的全新技术、信息、知识将取代其他因素,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的决定力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及世界的发展方向。军国主义、强权政治必将被新的时代所代替。而且,军国主义历史观即使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旧时代,它也不是一种代表人类进步和社会正义的思想观念,而是为黑暗专制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的,是一种颠倒历史,完全荒谬的反动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在历史上,是与人类的和平正义不相容的;在当今时代,则是同世界前进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它在本质是反民主、反和平、反人类的意识形态。

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观是近代日本社会畸形发展的反映,也是近百年来日本与中国、朝鲜以及亚洲国家不平等关系的反映。最近若干年以来,日本国内一些人一方面把正确的历史认识称为“东京审判史观”、“自虐史观”、“反日史观”,另一方面,为了掩人耳目,他们鼓吹要“超越”所谓不同的意识形态历史观,还把这种军国主义历史观美其名曰“自由主义历史观”,自相矛盾到了极点。因为从常识上说,历史观本身也属于意识形态,同时它又被总的意识形态即哲学世界观所决定,可以说有多少意识形态,就有多少历史观,所谓“超越”,只能是妄言,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从总的方面划分,确实始终存在着能够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反映人类社会前进运动的客观规律,推动思想发展的进步的意识形态及历史观,也存在颠倒和歪曲历史,宣扬有害于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反对意识形态及历史观。自由主义从科学上说虽也不完全是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念,但是它与军国主义却不可同日而语。自由主义在日本或其他

国家确曾是一些进步力量反对专制主义及其他反民主、反人民倾向的政治口号。军国主义历史观是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历史观念完全不相容的。

军国主义历史观不断受到亚洲各国及日本人民的批判。早在明治 20 年代,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的新研究》即已对神代史提出否定批判,认为神代史不是事实,而是人为编造的传说,从而对天皇制进行了否定。在日本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国体”问题的争论,即在不同时期,日本进步政党和社会民主力量,对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政治、军事、社会制度及以“皇国史观”为中心的军国主义政治、思想、历史等观念进行批判。天皇也发表了“人格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上天下到人间的神,对历代天皇所拥有的神权做了自我否定。日本进步历史学家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日本的下一代,拟定和出版了大批有价值的、能够正确解说日本近百年历史的史学著作,对军国主义的历史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对近代军国主义进行了清算。前东京大学教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执笔者家永三郎,30 多年来坚持用日本人民“为什么没有防止战争”的正确思想,编写历史,教育国民,反对文部省对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内容的无理审查删改,并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胜诉。1997 年 8 月日本各和平团体和进步人士开展多种纪念活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准美化侵略,争取与亚洲共存”,“继续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作为加害者的责任”,“反对靖国神社由国家经营”等口号,要求日本政府正确对待历史,确实改善与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关系,建立真正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睦邻关系,而不是凌驾于人,走损人利己,互相敌视的道路。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近代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巨大发展,应当肯定,这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也表明,由于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使当前日本的国内外政策及其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正在面临着重大抉择

国家确曾是一些进步力量反对专制主义及其他反民主、反人民倾向的政治口号。军国主义历史观是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历史观念完全不相容的。

军国主义历史观不断受到亚洲各国及日本人民的批判。早在明治 20 年代,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的新研究》即已对神代史提出否定批判,认为神代史不是事实,而是人为编造的传说,从而对天皇制进行了否定。在日本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国体”问题的争论,即在不同时期,日本进步政党和社会民主力量,对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政治、军事、社会制度及以“皇国史观”为中心的军国主义政治、思想、历史等观念进行批判。天皇也发表了“人格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上天下到人间的神,对历代天皇所拥有的神权做了自我否定。日本进步历史学家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日本的下一代,拟定和出版了大批有价值的、能够正确解说日本近百年历史的史学著作,对军国主义的历史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对近代军国主义进行了清算。前东京大学教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执笔者家永三郎,30 多年来坚持用日本人民“为什么没有防止战争”的正确思想,编写历史,教育国民,反对文部省对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内容的无理审查删改,并多次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胜诉。1997 年 8 月日本各和平团体和进步人士开展多种纪念活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准美化侵略,争取与亚洲共存”,“继续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作为加害者的责任”,“反对靖国神社由国家经营”等口号,要求日本政府正确对待历史,确实改善与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关系,建立真正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睦邻关系,而不是凌驾于人,走损人利己,互相敌视的道路。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近代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巨大发展,应当肯定,这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明显的事实也表明,由于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使当前日本的国内外政策及其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正在面临着重大抉择